

国外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理论辨析*

王爱云/文

[摘要] 1949年以来,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涌现了一批代表性成果。国外学者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运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中的一些学科理论或概念来分析中国问题,这使他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理论色彩。对国外学者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所运用的理论进行深入辨析,有助于辩证地看待他们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当代中国社会研究 西方社会理论 中国本土化实践

1949年以来,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构成、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社会变迁等重要领域给予持续关注。在研究过程中,国外学者注重运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中的一些学科理论或概念来分析中国问题。有的学者结合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具体实际,在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时将国外有关理论予以中国本土化关怀;有的学者则“张冠李戴”,把国外理论直接拿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不管其适用与否。辩证地看,虽然国外学者所运用的这些理论很大一部分源于国外社会实践而非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但其规范化、学理化做法对于今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炼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有一定的启发。

一、关于工业化与社会变迁的理论

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国外学者认为,工业化会促进人口增长、教育普及、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加剧贫富分化和环境污染等。在他们眼中,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也会出现与欧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相同的社会变迁情况。循着这一思路,自1950年代开始,国外学者运用西方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变迁的一些理论,观察并预测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外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评析”(15BDJ027)的结项成果。

(一) 运用工业化进程中家庭变迁模式的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家庭变迁

1963年,美国学者威廉·J·古德在《世界革命和家庭模式》一书中通过考察美国、西欧、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中国和日本家庭的变化,概括了世界各地家庭的结构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他提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大家庭和较大的亲属群体遭到破坏,现代家庭不断朝着夫妇式家庭的方向发展,这种夫妇式家庭的特色包括:独立于传统大家庭之外,以夫妻为中心,夫妻自主组建家庭,结婚年龄晚,生育率取决于夫妇自身的需求,离婚率高,再婚率高,等等。^① 1973年,美国学者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在《家庭》一文中运用古德的这一理论模式分析当代中国家庭发生的变化,指出在当代中国家庭中,家族和亲属权力下降、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增加,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上升,这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家庭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怀默霆由此认为,中国的经验说明,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更适合工业化社会的是夫妇式家庭而不是传统家庭。^②

到1990年代,国外学者仍在讨论古德的家庭变迁模式的有效性。有人认为,这个理论仍然适用于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推动了中国家庭的“现代模式”——晚婚,家庭规模较小、结构不复杂,以及私人 and 公共领域妇女地位不断提高。1992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教授黄树民(Shu-min Huang)发表文章《重新审视中国农村社会的大家庭:一个福建农村的调查结果》认为,改革开放后,政府通过鼓励发展副业,努力实现农村经济多样化,从而促进了竞争,推动了传统大家庭的解体。^③ 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例如,1997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温苑芳(Yuen-fong Woon)发表文章《经济发展和家庭模式:华南两个侨乡农村家庭比较研究》,以广东省台山县端芬镇和开平县赤水镇两个镇共计103个农村家庭为

分析对象,重点考察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是正在发生现代化变革还是正在恢复1949年前的传统,以及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引起这种变化。她认为,经济改革的深化确实使农村家庭产生了现代家庭的特征,但是家庭的现代特征与传统特征又可以在同一社会经济领域共存,二者没有任何矛盾。^④

(二) 运用工业化进程中住房短缺的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住房问题

国外学者认为,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快速的工业化总是伴随着严重的住房问题,因为国家面临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压力很大。而一个国家的住房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社会生活水平,而且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有一定影响。自1960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就基于这种认识来研究当代中国城市住房短缺问题。1966年,《亚洲研究杂志》发表《工业化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城市住房》一文,考察分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城市住房短缺情况,认为推进工业化是城市住房短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文章还指出,尽管总体上中国的住房呈现短缺,但是城市居民的住房分配是平等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城市住房问题上的显著成就。^⑤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存在住房短缺问题,但是造成住房短缺的具体原因是不同的。国外学者对

① William J. Goode,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pp. 7-10.

② Martin King Whyte, "The Family",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No. 1, 1973, pp. 190-192.

③ Shu-min Huang, "Re-Examining the Extended Family in Chinese Peasant Society: Findings from a Fujian Villag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 1992.

④ Yuen-fong Wo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mily Patter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easant Family in Two Overseas Chinese Homelands in South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Vol. 12, No. 3, 1997.

⑤ Kang Chao,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 Housing in Communist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5, No. 3, 1966.

此进行了深入分析。1988年,美国东西方中心学者李煜绍(Yok-shiu F. Lee)发表文章认为,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严重的城市住房问题。^①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住房的短缺问题不是因为市场,而是由政策指令和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具体来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城市住房短缺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国家对住房建设投资不足。一方面,中国将实现工业化作为目标,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对城市住房的整体需求;另一方面,中国将城市住房视为“非生产性”投资,因而相对于建筑工厂和大型工业项目等“生产性”投资,城市住房建设投资不在优先之列。第二,国家采取了向城市居民收取极低住房租金的政策,而租金的很大一部分又用于对现有住房的维护和修理,这就导致建造新住房的能力显著降低,新房存量增长极为缓慢。第三,在住房投资预算紧张及增长缓慢的背景下,住房建设标准却不断提高,从而转化为更高的建筑成本,进一步制约了新住房的增加。鉴于住房短缺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文章认为,解决中国城市住房短缺问题不仅需要增加国家投资,改革廉租政策和调整住房标准也是必不可少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行住房商品化、货币化政策,进行了住房制度改革。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推行这种住房改革会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带来贫富两极分化,导致城市贫困人口乃至贫民窟的出现。例如,2006年,《太平洋评论》杂志发表《中国的城市治理、新自由主义和住房改革》一文认为,中西方在发展不均衡、社会两极分化和重构福利制度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文章以贵阳住房改革为例考察了住房改革导致的不平等、城市贫困和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认为“中国的货币化住房改革是新自由主义发展的一种工具,而不是改善住房条件的一种政策”^②。

(三)运用西方教育理论研究当代中国教育发展

新中国教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必须为广大人民服务,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新中国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进行了根本改革,努力把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转变成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教育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成为了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

然而,西方人本主义教育理论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人的自我实现、完美人性的形成,以及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从这种理论出发,国外一些学者就新中国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提出了一些片面的错误观点。例如,1965年,《中国报告》杂志发表的《中国的教育变革》一文指出:“在中国,教育不是为了个人获得更多的知识,而是为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文化服务,实际上就是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地位。”^③还有研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最大问题是过于功利主义,教育已不再是人们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媒介,而是服务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给高等教育的性质和内容带来了决定性变化,高校和技术学院培养人才是为了实现工业化。^④

进入发达工业社会之后,高等教育往往会得到大规模扩张。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rtin Trow)在1962年提出“大众高等教育”概念,1970年提出“普及高等教育”概念,1973年提出“高等教育三阶段论”,认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低于15%为精英化阶段,大于15%、小于

① Yok-shiu F. Lee, “The Urban Housing Problem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1988.

② James Lee and Ya-peng Zhu, “Urban Governance, Neoliberalism and Housing Reform in Chin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9, No. 1, 2006, p. 57.

③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China Report*, No. 1, 1965, p. 15.

④ Immanuel C. Y. Hsu, “The Reorgan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49-61”,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 1964.

50%为大众化阶段,大于50%为普及化阶段,大学的招生、入学等在每个阶段都存在不同的特点。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学说是以美国为样本、以欧洲(尤其是英国)为参照提出的,这些国家大多已经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一些学者将之运用到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当中。2006年,《中国季刊》发表文章《毕业生失业:中国转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困境与挑战》,试图用中国的实践来验证并发展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① 文章记述了中国高等教育自1949—2005年的发展历程,分析了1999年高校扩招的直接原因,认为中国扩大高等教育的直接动机是促进国内消费,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国内消费一直低迷,作出这一决定部分是基于它将有效地刺激中国经济的判断;同时,1993年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批职工下岗,城市失业率持续上升,1999年高中毕业的300万学生如果大部分不能升学,必然会令就业形势恶化。特罗认为,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有三个方面的困境:一是高等教育的所有规定都应该有利于实现教育质量均等化;二是大众化高等教育所依赖的评价标准仍然主要是精英高等教育原有的标准;三是高等教育迅速甚至几乎无限制地增长,给国家和政府预算增加了难以承受的负担。^② 根据这一理论,文章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财政负担加重、学费上涨、教学质量下降、教学条件恶劣等,认为这些都成为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导致大学生失业率的上升。

(四) 运用西方环境保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环境保护与治理

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在带来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国外学者在关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也开始观察中国的环境问题。他们把现代化视为造成工业污染的核心因素,并运用

环境威权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环境治理的政策与实践。环境威权主义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L. Heibroner)于1974年在《人类前景探析(*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一书中提出的理念,之后发展为环境政治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通过集权的方式才能实现环境的有效治理,因而应由中央政府采取命令管制型政策工具实现环境目标。2010年,西澳大利亚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马克·比森(Mark Beeson)在《环境政治》杂志发表《环境威权主义的到来》一文,提出“中国环境威权主义”概念。2013年,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系张悦悦(Joy Y. Zhang)与纽卡斯尔大学国际政治学系迈克尔·巴尔(Michael Barr)在《中国绿色政治:环境治理与国家和社会关系》一书中运用环境威权主义理论考察中国基层的环境治理行动,认为如果权力掌握在一群有能力且没有腐败的精英手中,环境威权主义就会发挥作用。^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在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发生的社会变迁与西方工业化进程具有一些共性。因此,国外学者运用工业化理论来观察中国,有些情况下是适用的。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从社会层面来说,西方现代化是由少数资产阶级发动、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种情况下,西方工业化进程

① Limin Bai, “Graduate Unemployment: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in China’s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5, 2006.

② 马丁·特罗:《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王香丽译,谢作栩校,载《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年第1期。

③ Joy Y. Zhang and Michael Barr, *Green Politics in China: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State – Society Relations*, London: Pluto Press, 2013.

中的社会状况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不相同,因而国外相关的工业化、现代化理论不完全适用于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实践。

二、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均较低,属于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后,尽管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国民收入不高,发展不均衡,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较大,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国外学者看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具有共性,因此可以将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理论用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问题。

(一) 运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 Lewis)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一种关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城乡二元经济、技术、金融、社会结构的理论。城乡二元结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刘易斯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过剩问题,由此考察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因此存在着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农业部门的隐性失业。^① 国外学者运用这一理论来观察和分析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劳动力就业状况。例如,1964年,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埃德温·P. 鲁本斯(Edwin P. Reubens)在《隐性失业理论与中国共产主义经验》一文中研究了新中国的就业问题,认为195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状况,是由于政府安排农业劳动力兴修水利、道路、铁路等非农事务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通过

精简职工等行政手段,将大量干部职工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然而,这一做法却忽视了实际存在的农村隐性失业问题。^②

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劳动力出现过剩现象,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又出现了民工短缺的现象,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很多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增加,却招不到工人。根据刘易斯的理论,农民工短缺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在家乡可以获得的收入与在城市就业的收入差距有所减少。2007年,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邵思君(Sijun Shao)等学者在《作为同质经济人的农民工:解释中国沿海省份劳工短缺的新现象》一文中运用刘易斯的理论模型指出,农民在决定是否外出务工时,不是将农村工资与城市工资进行比较,而是将农村工资与低于城市工资的农民工工资相比。文章认为,农民工短缺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工工资总额(包括实际工资和社会保险福利)低于城市工人,并且在长时间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下面临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歧视。为此,政府应提高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改善其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水平,并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③

(二) 运用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收入分配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提出的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变化的倒U曲线理论是一种发展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之初,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

① 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② Edwin P. Reubens, "Under-Employment Theory and Chinese Communist Experience", *Asian Survey*, Vol. 4, 1964.

③ Sijun Shao, et al., "Migrants as Homo Economics: Explaining the Emerging Phenomenon of a Shortage of Migrant Labor in China's Coastal Provinces", *China Information*, Vol. 21, 2007.

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即呈颠倒过来的U型。

2003年,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詹姆斯·尼坤(James E. Nickum)发表文章《市场中的碎鸡蛋:中国不平等的上升》,运用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问题。文章考察了中国收入分配情况,指出改革本身并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尤其是1980年代初期,国家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使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平等。但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开始扩大。文章认为,中国经验表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比库兹涅茨在其理论中所阐释的机理要复杂得多,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超出了西方既有理论的解释力。^①

(三)运用庇护主义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关系

庇护主义对于解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尤其是政党政治)发展现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庇护主义是指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人(庇护者)运用其影响和资源给地位较低者(被庇护者)提供保护或利益,后者则回报以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和理论视角,庇护主义理论从最初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被引入政治学科,政治庇护主义被视为主体或多种主体之间个人化的、感激的、互惠的关系,这些主体掌握着不平等的资源并进行互利的交换。

在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时,斯坦福大学教授戴慕珍(Jean C. Oi)等运用庇护主义理论来分析农村干部与普通农民之间的非正式关系。1989年,戴慕珍出版著作《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农村治理中的政治经济学》,用庇护主义理论来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认为农村干部对农村资源分配具有垄断性权力,农民取得资源依赖于干部的分配,从而形成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庇

护关系;改革开放后,虽然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副业生产的经营仍然依赖于农村干部,因此庇护主义依然存在。戴慕珍指出,只要商品、资源和机会的分配处于农村干部的职权范围之内,庇护主义就会一直存在。在戴慕珍看来,中国农村庇护主义关系的存在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使然,因为物资短缺、集中式分配体制、村干部个人对资源和机会的掌握,造成了庇护主义在中国农村社会难以避免。^②

1999年,日本上智大学教授王达伟(David L. Wank)出版《共产主义商品化:中国城市中的商业、信任和政治》一书,用庇护主义的理论框架分析个体户利用“关系网”来发展商业的过程。该书指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仍然可以调控商品价格,这使得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兴个体户与干部之间形成了庇护主义关系网络。该书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业关系网仍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起源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研究的一些经济理论,对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确实因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而有一定的适用性。然而,用庇护主义理论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干部与个体户的关系,实质上曲解了当代中国干群关系的实质,因此这种理论运用显然是不恰当的。

三.起源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的理论

国外学者在研究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时,根据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

① James E. Nickum, "Broken Eggs in the Market: The Rise of Inequality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49, 2003.

② 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③ David Wank,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一些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国外学者,直接用这些源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的理论来观察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

(一) 运用“新阶级”理论研究当代中国阶级阶层状况

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万·吉拉斯在1957年出版的著作《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中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了“新阶级”^①。这一概念在西方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一些国外学者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时,直接运用这一概念分析中国的阶级阶层状况。例如,怀默霆在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时就援用这一概念分析“中国的新阶级”^②。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舟(Joel Andreas)也赞成这一理论,认为中国存在“新阶级”。2009年,他在《红色工程师的崛起》一书中沿用“新阶级”这一概念,并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把政治资本(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和特定党派成员身份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文化资本(基于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资本(基于生产资料占有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三者综合起来,作为划分中国“新阶级”的标准。^③

(二) 运用“再分配经济”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

“再分配经济”这一概念来自匈牙利裔美国社会学家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对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他把东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称为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是政府再分配干预的结果,而那些在再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工人和农民只能通过次级“协调机制”,也就是萌芽中的市场,为自己争取利益。^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时,广泛运用了塞勒尼的再分配经济理论。例如,1989年,美国社会学者倪志伟(Victor Nee)在《市场转型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

渡》一文中提出,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根本改变再分配经济中以政治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从而降低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提高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也就是说,市场化改革从权力、刺激和机会三方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分层机制,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权力不断地从“再分配官僚”手中转移到“从事市场交换的直接生产者”手中,从而逐步减轻社会不平等。1991年,倪志伟在《改革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不平等:处于再分配与市场之间的中国》一文中提出,在改革尚未完成之前,由于再分配经济体制仍发挥作用,所以权力不是一夜贬值,而是仍然在局部改革中得到相当程度的经济回报。^⑤ 1992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阎云翔(Yunxiang Yan)在《从一个中国村庄看农村改革对经济和社会分层的影响》一文中印证了塞勒尼的观点。他写道:“集体经济时期,官僚再分配制度的特点是垄断经济资源和流动机会;改革开放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制度的力量,不仅导致经济地位的重新分配,而且导致社会地位的重新分配。由此,村庄中出现了社会分层的双重结构,即社会主义官僚阶级秩序与基于市场的经济阶层秩序共存。”^⑥

塞勒尼进一步研究了匈牙利1980年代市

① 吉拉斯认为,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蜕化为一种新的剥削制度,掌权的官僚集团变成了“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并非是一个真正的阶级,“本质上只是一个特权阶层”。

② 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页。

③ Joel 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伊万·塞勒尼等:《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吕鹏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⑤ 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第17、19页。

⑥ Yunxiang Yan, “The Impact of Rural Reform on Economic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 1992, p. 20.

场化改革后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他发现,仅仅引入市场并不足以纠正官僚特权的错误,新的市场机制导致了新的次级不平等。因此,要寻求一种能够抵消次级不平等的政策工具,就不得不创造“第三种机制”——福利再分配。^① 1986年,怀默霆在《中国社会趋势:不平等的胜利?》一文中联系中国的事实,驳斥了塞勒尼关于市场改革导致新的不平等的观点,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去集体化和私有化减少而不是增加了不平等。^② 1989年,戴慧思(Deborah Davis)在《中国社会福利政策和结果》一文中也认为,市场机制不是不平等加剧的唯一原因,中国在财政和行政问责上下放权力的做法明显加剧了社会福利产品领域的不平等。^③

中国与东欧一些国家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东欧的社会主义有很多不同之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土地革命、全民族抗日、人民解放战争等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没有形成官僚特权阶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在二战后期苏联出兵东欧、压制各国资产阶级力量、积极扶植左派力量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并逐步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成为其政权垮台的致命根源。在这种背景下,运用源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的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的阶级阶层状况和社会分层状况,是十分不适用、不恰当的,盲目挪用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四、关于全球化和后社会主义的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国外学者也开始运用全球化视野下的社会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后社会主义”是西方提出的概念,不仅指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的国

家,也包括像中国这样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 从全球化理论视角研究当代中国社会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新富阶层,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国外学者视其为“全球化的结果,因为这个国家不仅融入了世界经济,还在许多方面成为了所有全球化国家的焦点”。他们用新自由主义观点观察中国的新富阶层,视之为“社会变革进步的先锋”,是所谓“促进自由和民主”的力量。^④

尽管中国融入了经济全球化,在对外开放中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也会发生同其他全球化国家一样的变化。实际上,中国的新富阶层虽然拥有资本,但是他们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运用资产阶级性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无疑是错误的,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 运用后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

后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转型”。2002年,倪志伟和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曹洋在《后社会主义的不平等:其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原因》一文中把经历市场转型的中国看作后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只有超越了临界点后,以市场为基础的分层秩序作为一个整体才开始在后社会主义分层秩序中呈现优势

① 伊万·塞勒尼等:《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第183页。

② Martin K. Whyte, “Social Trends in China: The Triumph of Inequality?”, in A. Doak Barnett and Ralph Clough (eds.), *Modernizing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6, pp. 103-124.

③ Deborah Davis, “Chinese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and Outcom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9, Special Issu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40 Years, 1989.

④ David S. G. Goodman (ed.), *The New Rich in China: Future rulers, Present L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1, p. 242.

的形态;在此之前,以市场为基础的分层秩序都从属于先前存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分层秩序”。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对1990年和1995年中国家庭收入数据进行了对比,用以考察分析中国社会分层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①戴慧思在考察19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住房私有化对婚姻的影响时,也将之作为后社会主义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②

不同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这些国家由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把中国与剧变后的东欧国家、独联体国家笼统地纳入后社会主义国家,用后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研究,显然从根本上混淆了两者的社会性质,认为它们会有共同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经验,这种研究从出发点到结论都是不科学甚至是错误的。

五、正确看待国外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的理论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进行了持续的关注。他们运用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来观察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其观点和成果参差不齐。因此,有必要厘清其对国内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消极影响。

一方面,国外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时重视理论的运用,尤其是他们结合中国本土化实践,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践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从方法论来看是值得提倡的。应当看到,国外有着研究中国社会的悠久传统,相关研究开展得比较早。加上西方很多国家进入工业化、全球化进程比中国早,国外学者较多了解工业化、全球化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因此,他们能够运用相关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在运用国外理论观察中国社会时,国外学者也能注重结合中国的

实际情况进行理论调整。例如,在对中国改革开放前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中,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Peter M. Blau)与奥蒂斯·邓肯(Otis Dudley Duncan)提出的社会地位获得模型是国外学者的主导研究范式。该模型基于20世纪中叶美国的社会实践认为,社会地位的获得由先赋性因素(父代教育程度、父代职业地位)和自致性因素(子代教育程度、初职地位、现职地位)这两组变量组成。布劳和邓肯的研究指出,现代工业社会中先赋性因素并非地位获得的主要途径,而是更多地依赖个人的人力资本和努力。1986年,斯坦福大学教授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在《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一书中阐明了工作单位作为政治经济地位的重要性。1992年,魏昂德发表文章《再分配经济中的产权与分层》,再次说明工作单位在再分配经济的社会分层体系中是很重要的分层标准。魏昂德的这一观点得到国外学者的广泛认同,他们在运用布劳—邓肯社会地位获得模型研究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分层时,首先增加了对工作单位的地位的考量。之后,又有学者在“获得性社会地位”这一变量上,增加了对政治地位的考量(如党员身份)。^③这种调整使国外学者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加入了中国本土的内容。中国本土化关怀使国外学者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理论具有了一定的“欺骗性”,并在一段时间内为国内学界尤其是青年学者所接受和效仿。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国内学者在仿效国外学者的研究路径时采取了

① Victor Nee and Yang Cao, “Postsocialist Inequality: The Causes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Vol. 19, 2002, pp. 3–39.

② Deborah Davis, “Who Gets the House? Renegotiating Property Rights in Post-Socialist Urba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36, No. 5, 2010, pp. 463–492.

③ 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第116、553页。

批判性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了讨论和本土化修正。

另一方面,有些国外研究存在照搬国外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现象。从国外学者运用相关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实践来看,一些国外学者直接照搬国外相关社会理论,意图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观察来验证国外相关理论的正确性,并且按照他们的理论范式预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社会政策提出意见建议,希望当代中国社会按照他们的预期来发展。

然而,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抛开这一点,得到的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国外很多社会理论的实践本源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与变迁,其工业化发展、市场经济发展与当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他们的理论不可能完全契合中国的现实。而且,中国地大、人多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就注定不是某一种单一理论模型所能解决的。一种理论模型可以找到它能运用的资料和领域,但是它并不总是有效的,也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

进入 21 世纪,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西方现代化以及西方社会理论并非普适的道路与科学,必须立足中国实际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例如,有学者指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要“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正确总结‘中国理念’,探索‘中国道路’”,“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例、一个验证”。^①

新时代,党中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

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②“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③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必须以中国为观照,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中国自身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当代中国社会自主知识体系。■

[王爱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 史佳可)

① 郑杭生:《中国社会学不应在西方的笼子里跳舞》,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年8月26日。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年第17期。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4页。